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党在浙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

□ 李昊翔 李海峰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

室和旁边一座旧建筑作为办学场所。招生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闽浙边各地党组织推荐、动员；二是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名义，在《浙西日报》刊登广告公开招生。第一期训练班招收150多人，年龄大多十七八岁，基本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著名小说家林斤澜便是其中一员，来校时只有14岁。学员主要来自浙江各地，少数来自江苏、上海等地。

经闽浙边临时省委任命，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粟裕兼任校长。教职员由组织上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人员担任。除了赫赫有名的粟裕，很多教员也都“身怀绝技”，如哲学教员孙克定，后来被誉为“军中数学家”；党总支书记江如枝是当年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电讯人才……学校创办期间，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曾山曾来校作政治报告，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等人也数次来校作报告。

学校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教材选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教学目的是使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和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粟裕为学员讲授了26课合计30多个小时的军事课。他还结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经验专门编写了教材——《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据学员回忆，当时的粟裕校长，头戴黑色棉布帽，身着黑色军装，讲课时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他常用泥沙堆起模型沙盘作为教具，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生动地为学员们讲授游击战术。每当他讲课时，教室内外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教学方式采用上大课、分散讨论、军事训练、野外演习等灵活组合。学校曾以食堂不开火为由，要求学员自己“找饭辙”，“逼迫”大家深入周边进行社会调查。学校还开设列宁室，组织学员开展宣传、研讨、编排短剧、球赛等活动。这些教学方式有效提高了学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本领。

学员管理沿袭“抗大”校风，采取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起床，晚上9点就寝，学员必须按时完成教学计划安排的军事训练和相应的文化课程。当时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春寒料峭的时节，开水不够用，没有床板，也没有电灯，学员就用冷水洗漱、铺稻草打地铺，晚上靠昏暗的油灯照明。艰苦的学习生活，锻炼了学员的意志品质。

学员结业后，一些经临时省委批准，组成随军服务团，随部队北上抗日前线；一些组成新四军流动宣传队，携带《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告父老同胞书》等文件，深入温州瑞安、平阳、泰顺三县的农村山区，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大多数则由临时省委分配到浙江各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开辟新区工作。陈雨笠、程望、施光华、邱清华等学员都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在严酷战争环境中，不少学员为祖国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最小的年仅19岁。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办学成效显著，它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在当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员回忆称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是他们的“革命摇篮”。学校第一期训练班结业时，各地党组织又介绍了近百人来参加第二期训练班的学习，但因革命形势需要，粟裕和一些主要教员带领部队北上奔赴抗日前线，学校终止办学，前来参加第二期培训的学员被动员回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今这所学校的旧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接待着来自各地的学习者和参观者，重温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阳春布德泽

□ 贺亚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二月底的一个午后，我接到前往中央党校培训的通知，心里暖暖的，这消息恰似一场润泽心田的春雨，让我对提升自己的素养和能力满怀新的期待。阳和启蛰，品物皆春。2月28日，我怀着崇敬与激动的心情，踏入向往已久的中央党校，就此开启一段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之旅。

开学典礼上，庄严肃穆的氛围感染着每一位学员，那是知识殿堂的大门敞开的时刻，让人内心深处燃起一股奋斗的力量。党支部见面会，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迅速凝聚成一个温暖的集体，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充满期待。党小组讨论热烈而深入，思维的火花在交流中不断碰撞。教学引言和教学说明就像路标，给学习指引方向。基础理论课、专业课、选修课，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从不同维度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宝库。形势与任务报告会，让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洞悉国家发展的脉搏。双向交流、学员讲堂、学员论坛等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教学安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让人时有一种“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启迪和震撼。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每一堂课，我们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迫不及待地汲取知识的养分，早早进教室，认真记笔记。即使是近4个小时的课程，礼堂内也始终很安静。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笔记。课后，党校的各个角落都成了我们交流讨论的天地。饭桌上，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着课堂上的收获与感悟；走廊中，大家热烈地探讨着某个理论问题；掠燕湖畔，微风拂过，杨柳依依，湖面泛起涟漪，漫步湖边，我们交流着各自工作的困惑；千翠山前，我们站在自然的怀抱中，畅谈着如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清风园里，我们沉浸在静心的环境中，叩问自己的灵魂，如何做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校史馆中，我们在历史的沉淀中，找寻着前行的动力。每一次交流，都让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每一次讨论，都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一组组伟人雕像前，我情不自禁泪湿眼眶，从内心深处生出崇敬而庄重的情感。那些雕像承载着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在中共党史文献中心，我逐字逐句研读习近平总书记1996年发表在《理论学习月刊》第11期上的《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兼论邓小平

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大发展》等文章，仿佛穿越时空，与伟人对话，感受着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翻阅《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2024年）》等书籍，那些生动的案例，让理论变得鲜活起来，让我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让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从历史深处迈向未来，以理论厚度涵养实践，这是党校给予我的宝贵财富。

知之深，爱之切。夜深人静的校园，“实事求是”石碑、广场中心“我们的老校长”雕塑以及大礼堂，在路灯下遥相呼应、熠熠生辉，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校训的灵魂，时刻提醒着我们，做学问、干工作都要脚踏实地、尊重事实。“我们的老校长”雕塑，让我们铭记党校的历史、传承党校的精神。大礼堂，承载着无数次重要的会议和讲座，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学员在这里成长，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国家的栋梁。在这片知识的沃土地上，我们不断汲取营养，坚定信念，超越自我。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宛如春天里的播种，每一个知识的种子都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我期待着它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开花结果，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外婆桥边清明时

□ 刘 峰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人间四月天，正值清明时节，于吱吱呀呀的橹声中，我与母亲乘坐一条木船，去几里外的水乡给外婆扫墓。

这一条水路，自打小，我就与母亲来来往往，不知走过多少回。那时通信不发达，乡村还没有通电话，外婆估摸我和母亲的到来，便从早上开始，不时在村前的一座石桥上翘首以盼。那是一座青石古桥，于两岸田园风光的映衬下，宁静、古朴、安详，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韵致。

外婆爱她的女儿，更爱我这个小外孙。每一回，船离石桥一箭之遥，我就远远地看见外婆在桥上招手，她是那样激动，让我们母子俩见了一种满满的幸福感。下了船，外婆笑吟吟地迎了上来，一手牵着我，一手挽着母亲回家。我们经过一片竹篱，绕过几株古桑树，再穿过一条青石小巷，就抵达了粉墙黛瓦的外婆家。听母亲讲，外婆原来家境富裕，曾读过不少书。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自外公去世后，她独守这一座老房子，孤独感可想而知。母亲每次带我回来，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人家的寂寞，能让她欢欣好些天。

外婆对我疼爱有加，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隔代亲”。她给了我许多的爱，但绝不是一味的“溺爱”。

村后有一座山冈，山冈旁边是一片农田。外婆去地里干活时，会带上我，同时不忘给我的口袋装上几本小人书。她在地里劳动，我坐在草坪上有滋有味地看书。附近有河流，小孩子乱跑会有危险。她干着活，眼角的余光却不时瞟向我。只要有空，她就与我一起采山花、觅野果、捉蚂蚱、找野兔，带着我玩得特别开心。

近晌午，祖孙俩乐不思归，干脆不回家了，吃了带来的干粮，就躺在草坪上歇息。周围真安静呀！闭上眼睛，可以听见天空上雄鹰划动翅膀的声音。在馥郁的野海棠花香里，我听外婆娓娓讲述那些在书本里看不到的乡村逸事，沉浸在古老而鲜活的传说中。这一切，无形中给了我美育的启蒙。

不知不觉，鲜红的夕阳滑向不远处的那一条长河。黄昏安宁，一派静美。山冈的灌木丛染染了余晖，仿佛要燃烧起来。我和外婆依偎着，静静坐在山冈，目送飞霞，遥寄远目，凭思绪翩飞，仿佛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外婆是第一个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的人。沉醉在书香、花香、草香里，我开始萌生许多梦想，当我告诉外婆长大了想当作家、画家时，她笑得那么开心，简直合不拢嘴。

最令人难忘的，是若干年后的一个油菜花开的春天，风烛残年的外婆抱着病

躯，步履蹒跚来到石桥，目送我同母亲乘舟远去，直到母子俩的身影隐没在春烟里，她还站在桥上，仿佛一只飞累了的老燕。

今我和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了阴阳两隔。依照外婆“此身只合故园老，水乡山冈好墓田”这一纸遗嘱，山冈成了外婆最后的“家”，正对着石桥的渡头方向。

后来，长大后的我，怀着作家梦、画家梦，走出了乡关。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异乡漂泊的日子，有太多的艰辛，但不知为什么，梦中的我，一次次回到与外婆相处的时光，仿佛有一缕阳光照进心中，抚摸着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予我以慰藉。这别样的温暖，慢慢化作一缕甜蜜的乡愁。

外婆，您依然活在我的梦里，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在这个清明节，思念外婆太久的我，决定归来给老人家扫墓。当我和年迈的母亲乘船从水路出发，两岸倒影如昨日，风景依稀似去年。耳畔，又响起儿时的那一首歌谣：“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踏青的时节到了。走进郊野寻觅春天芳踪，看碧水蓝天，观草木葱茏，闻百花清香，听燕子呢喃，让人身心愉悦、心胸开阔，这是大自然对人类最美好的馈赠。

在我国传统民俗中，踏青又称踩青、探春、寻春。春日郊游踏青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出现。《史记·殷本纪》中玄鸟生商的故事，便涉及春天郊游之事。周代文献也有记载，《诗经·郑风·溱洧》里便描写了郊游踏青活动。

在汉代，踏青与祭祀活动逐渐融合。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成为踏青的重要节日，人们在这一天到郊外洗濯袪除、祈福消灾，同时享受春日自然风光。张衡在《南都赋》中描述道，“于是暮春之楔，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疲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齐倡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虫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踟蹰而容与……夕暮言归，其乐难忘”。郊游场面甚为宏大。

魏晋时期，春日郊游活动颇为流行。据《晋书》所载，每年三月初一至初三，人们常常外出踏青。此时的



□ 潘春花

郊游，文人雅士多参与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曲水流觞”，即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的集会。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记其盛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隋唐时期，郊游踏青之风空前兴盛。隋朝展子虔创作的《春游图》是我国迄今存世最古老的画卷，这幅图展现了古人骑马乘舟在山水间游乐的场景，画面中青山叠翠、水波荡漾、杏桃绽开，一幅春意融融的景象。唐代孟浩然有“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

月”的诗句。白居易的《春游》诗曰：“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足见当时郊游踏青盛况。

据一些民俗学者考证，唐宋以后，清明节逐步取代了上巳节和寒食节。踏青也成为清明节习俗中，除祭祖扫墓之外的重要活动之一。

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都城东京（也称汴京，今开封）人在清明节郊游的情景：“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其郊游之盛，可见一斑。张择端的名作《清明

上河图》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汴京人们在清明节这一天郊游踏青的情景。

到南宋时，清明节踏青已成为时人风俗，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叙了南宋都城临安人春游踏青的情景：“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在他的笔下，春游的人们挤满了西湖堤岸，游船多到无行舟之路，唱歌和箫鼓之声震动四方。朱熹的《春日》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

景一时新”，亦抒发了诗人于风和日丽之时，在泗水之滨游春踏青的愉悦心情。

明清时期，清明节踏青之俗更为固定。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而在很多地方，踏青游玩拓展到整个春天，内容也更加丰富。《杭州府志》说，“二月花朝以往，士女急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先南屏，次放生池、湖心亭”，“每当春日，桃花盛放，一望如锦，游人多问津焉”。《绍兴府志》记载，“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

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甍鲜明，酒樽食具甚盛”。

郊游踏青虽选在一年之春，但历朝历代南北各地有先有后，各不相同。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说：“蜀地正月初三踏青，闽粤在二月初二日，北方则到三月或四五月方可见青。”事实上，人们心中最认同的那个踏青时节是清明节。清明节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日子，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节日。

踏青这一民俗的丰富历史渊源体现了中国人对春天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踏青不仅是一种民俗活动，更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到了万物吐故纳新、大地春和景明的时节，让我们走向大自然，感受这勃勃生机和青春的力量，不辜负这美好的春光。

